

南陵县文史资料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辑（第十五辑）

政协南陵县文史办公室



南陵县文史资料

第十五辑

一九九五年八月

封面题字：秦海全

封面设计：可 华

主 编：杨科华

责任编辑：（以姓氏笔划为序）

杨科华 崔文遵

崔鸿恩

版式设计：马孺子

内部发行 注意保存

印刷：南陵县印刷厂

工本费：6.00元

一九九五年八月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政协南陵县文史办公室

目录

南陵县文史资料

1995年第15辑

我们为什么抗战？	郭沫若(1)
刘少奇与华中敌后抗战	徐承伦(4)
抗日战争的两个战场在安徽	徐承伦(16)
皖南新四军在南陵的民运工作	马继庆(29)
陈毅率部东进抗日途经南陵的活动	戴立玉(33)
回忆抗日时期在皖南的几次战斗	高正木(36)
活跃在南芜地区的一支抗日武装	史斌(42)
抗日战争时期的南陵战役	马继庆(49)
血战堵击 猛打穷追	
——记抗日时期新四军皖南两次反“扫荡”	
.....	伍白丁(53)
忆国共合作南陵抗战	牧兆璠(64)
故园杂忆	盛学羲(69)
前事不忘 后世之师	
——抗日时期见闻琐记	汪炎亮(75)
拥军模范 名闻皖南	
——回忆妇抗会主任杨友道女士	
.....	吴祚民口述 汪炎亮整理(80)
竹枝词三首	
——为抗战胜利五十周年而作	伍白丁(83)
新四军皖南第一次反“扫荡”	
——父子岭战斗胜利纪实	傅兴华(84)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傅兴华(85)
甲午战争一百周年	
抗战胜利五十周年 感愤(排律)	傅兴华(86)
诗二首	章德华(87)
爱家乡父子岭	伍竹君(88)

目录

南陵县文史资料

1995年第15辑

血战花桥毛公山	马步云(90)
端雷官集据点	方家乐(94)
一日两次伏击战 痛打日本鬼子兵	李振全(96)
中国青年远征军印缅战争见闻纪实	王肇华(99)
追记远征军烈士吴均贵	伍白丁(105)
痛歼日寇 剑寒敌胆	
——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侧记	王肇华(108)
五十二师在南陵城抗击日寇	唐 风(115)
我所知道的白马山战斗	唐 风(118)
日寇轰炸南陵的暴行	崔鸿恩(120)
资料	
中国远征军组织的由来	(124)
南京大屠杀	(128)
南京大屠杀的真正罪魁	(130)
日本侵略军在南京杀了多少人	(131)
日本侵略战争对华的掠夺知多少	(132)
日本侵华战争我国伤亡 3500 多万	(133)
后 记	(134)

我们为什么抗战？

——为保卫自己的祖国

——为保卫世界的文化

——为保卫全人类的福祉

郭沫若

东方有一大群疯狗，这一大群疯狗便是日本国飞扬跋扈的军人。

日本的军人，尤其他们的领导者，他们自幼年时便受着偏颇的军事教育，他们的头脑异常简单，除掉侵略、占领、轰炸、屠杀之外，没有其他的词汇。他们自中东之战，日俄之战，历次的战役获得了战胜的甘饴以来，他们只知道战争的利得而不知道战争的惨祸，这，早昏迷了他们作为人而存在的良心，他们是把人的血液当成为醇酒了。

欧洲大战对于日本也有了偏惠，世界的均势渐渐地失掉平衡，日本的军人便愈加跋扈起来，他们在他们的本国是早已施行了军事的统制的。连那号称为自由主义者的日本的唯一的元老，西园寺公爵，都早已失掉了他的政治上的发言权，而且连生存权都时时要受着危害，其它是可以不言而喻的。

和平的日本，理智的日本，建设的日本，是早已窒息了。

日本就在这一大群的狂暴军人的统制之下，在吐放着他的

们的毒气。他们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他们不仅是想吞灭我们全体的中国，而且是想混一我们整个的世界。这，我们是明确地知道的。就是全世界的具眼的人士也是早已知道。

我们晓得，人类的福祉是在人类生活得到理智的统制时的和平状态之下所建设起来的。人类自脱离了兽域以来，他的目标是正确地向着人类的协和泯除着各个民族、各个社会的偏狭的传统，尤其个人所禀赋着的先天的兽性而前进着的。以往的人类文化是这样建设了起来，今后的人类文化也当这样建设起来。

我们中华民族素来是嗜好和平的民族，我们的祖宗替我们建设了四千年的文化，以仁义为大本的文化。这文化我们作为礼物赠送给了日本，使日本人早于千年以前脱掉原始的界域，和我们达到同一的水准了。

我们中华民族在最近的三百年内，曾受过一度原始民族，满洲人的蹂躏，受了他们的无理的统制束缚，聪明才智之士迭受摧残，因此，对于世界文化几乎没有丝毫的贡献。然而深赖欧美民族在和平的统制之下建设了新兴的科学文明，补偿了我们的陷缺。这文明又由欧美民族作为礼物赠送给了日本。使日本早于五十年以前脱掉封建的界域，又和欧美人达到同一的水准了。

然而日本人，在狂暴的军部统制之下的日本人，所回答我们的礼物是什么呢？是毁坏文明，摧残人类福祉的飞机大炮，毒气细菌！

日本的狂暴军部是世界文化，人类福祉的最大的威胁，这，是明而且白的事体。

不仅我们中国民族是达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就是整个人类都是达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

过往无数的志士仁人为谋人类福祉，费尽无数心血所创建的文化利器，都为日本军阀所逆用，用来毁灭我们全人类了。

我们中国民族本着他爱好和平的素质，我们被逼迫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我们现在提着正义的剑，起来了。我们不仅是为要争取我们的生存权，为要保卫我们的祖国而抗战，我们并且是为要保卫全世界的文化，全人类的福祉而抗战。

我们知道，我们的力量很薄弱；但我们的意志却很坚强。我们也明确地知道，日本军部的强悍是因有日本经济为粮台；而日本的经济基础是奠设在我们中国身上的。我们中国能制日本经济的死命，同时也就是能制日本军部的死命，古语云：“时日曷丧，余及汝偕亡。”我们要拼弃我们的一切，至少是要达到与日本军部同归于尽的一步。

我们就牺牲了自己的生存权，牺牲了自己的祖国，而使全世界的文化，全人类的福祉得到保障，我们能遂行着这种使命，我们是感觉着无上的光荣的。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朋友，保卫文化的战士，请你们一致起来和我们携手，为全世界的文化而战，为全人类的福祉而战，歼灭这东方的一大群疯狗！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七日草于上海飞机大炮的轰击中）

（原载《抗战三日刊》，转载《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战场》）

刘少奇与华中敌后抗战

安徽大学教授 徐承伦

刘少奇同志是在发展壮大新四军的关键时刻来到华中的。他于1939年11月初率中原局机关到达豫皖苏边区，11月底到达皖东，1942年3月，奉中共中央指示返回延安。

在华中，刘少奇把党中央关于大力发展华中的指示与当地的实际结合起来，总结了华中地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纠正了右倾错误和影响，迅速打开了抗战的局面，创建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刘少奇在华中两年多时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9年11月至1940年10月，他选择皖东作为华中的战略基地，直接领导皖东军民的抗日斗争，建立了皖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指导整个华中地区工作；第二阶段，从1940年10月至1942年3月，他领导新四军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新阶段，胜利完成了“贯彻党中央关于解决苏北问题、独立自主地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全会基本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强调独立自主地进行抗日战争。全会确定大力巩

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由刘少奇任书记。

武汉失守后，发展华中的任务更加紧迫。这时，日军在正面战场停止了战略性进攻，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蒋介石虽然同中国共产党实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始终把中共及其所领导的抗日部队作为敌人来看待。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后，虽然还继续抗日，但却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各地的反共摩擦日趋严重。从此，华中新四军既要抗击反共军的摩擦，又要担负抗击日伪军主力的重担，华中敌后战场逐渐成为全国抗战的主要战场。为了粉碎反共军切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联系，再分割消灭的阴谋，必须加强对华中的领导。

中共中央把华中作为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生命线。毛泽东和王稼祥联名发出的一份电报中说：“第一，华北敌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同时指出：“我军将来出路实在中原，此时不争，将来更困难了。”1939年1月，刘少奇率朱理治、郭述申、李先念等一行，离开延安，到达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正式建立中原局领导机关，安排了中原局的工作。中原局的主要任务是负责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一带党的工作，发动中原地区广大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3月，刘少奇奉命返回延安。

由于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执行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对于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的信心不够，害怕到敌后去活动，对敌后情况估计过分严重”，以致抗战初期，

“华中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及建立根据地的最好时机，就白白放过了”。针对项英不同意公开提出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口号的右倾思想，1939年4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东南局、中原局并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发出指示，强调指出：“目前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和目的，也是一切友党、友军、政府及全体人民共同的任务。因此，固然不应空喊这一口号，但也不必把这任务秘密起来，而应当主要努力去作。”但是，项英在给延安复电中明确提出：“目前不宜提出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作号召。否则，使同盟者害怕而对我更防范和限制。”

在项英右倾错误思想指导下，新四军和根据地建设都受到严重影响。长江以北的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虽然站稳脚跟，有所发展，但仍没有打开抗战的局面，不敢在皖东建设抗日根据地。据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回忆：“我们在江北反摩擦，搞些税收，他们还有意见，说这样搞政治影响不好。他们怕破坏统一战线，不敢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第五支队政治委员郭述申回忆：当时，“我们部队的活动、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枪支弹药补充没有来源，伤员的治疗条件很差，甚至解决部队的粮食、服装都很困难，抗日的局面还没有打开，形势对我们很不利。”

正如刘少奇在1942年2月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报告中指出，他到华中时，国内和华中的形势都很困难，由于项英的右倾错误，“使我党我军在华中抗战中的实际地位减弱，同华北和八路军的联系被隔断，陷于敌伪夹击的危境。”刘少奇就是在这种“危境”时刻来到了华中。

二

根据党中央东进敌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939年9月17日，刘少奇离开延安，前往华中，当时国民党顽固派采取各种手段，封锁控制延安派往新四军的人员。刘少奇化名胡服以徐海东“秘书”的身份，秘密前进。徐海东“以八路军高级军官身份，应付国民党军队的盘问，行程比较顺利。”

11月6日，刘少奇一行到达安徽涡阳县新兴集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驻地。在新兴集，刘少奇听取了游击支队司令兼政委彭雪枫、中共豫皖苏边区党委书记吴芝圃等的汇报。刘少奇“赞扬了新四军游击支队，认为游击支队是共产党新创建的部队中最好的之一。”并对游击支队和豫皖苏边区工作作了指示。

11月下旬，刘少奇一行离开新兴集，渡过淮河，抵达皖东定远县藕塘镇附近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同时，中原局机关也随之迁到这里。刘少奇到达皖东，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排除干扰，克服困难，领导华中全党迅速打开了敌后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首先，围绕抗日战争中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批判了王明右倾错误。1939年12月至次年1月、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局扩大会议，他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确定“发展华中”的指示，分析了右倾错误给皖东以至整个华中地区带来的危害。会议明确了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坚决反摩擦的斗争策略及大力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刘少奇在讲话中批判了在大别山替别人建立根据地的“苦力政策”。他引用了《孔子家语·贤君》中“徙宅忘妻”的故事：一个人健忘，搬家时把自己的妻子忘掉了。他说：“现在我们

碰到的问题比这还要严重，不仅把妻子忘了，而且连自己都忘掉了。为什么自己不去建立根据地，而要帮助国民党建立根据地呢？”他强调指出，中央的政策是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发展新四军，游击队要从大别山发展到东海之边。

在部队和地方传达贯彻刘少奇讲话精神和中原局的决定，振奋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精神。“以前受王明路线的影响，那种‘寄人篱下’受挫折而造成的抑郁心情为之一扫。各级领导干部自觉总结经验教训，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工作也有了办法。在正确路线指导下，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扭转了对我不利的形势”。

从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刘少奇领导皖东军民反“扫荡”、反摩擦，保卫和巩固了皖东抗日阵地。

1940年4月上旬，刘少奇来到津浦路东半塔集，与第五支队司令部一起活动。4月下旬，刘少奇北渡淮河，抵达泗县罗岗村，检查与指导皖东北地区的工作，听取了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长兼政委张爱萍等的汇报，并“对建党、建军、建设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进行具体指示。”

6月中旬，刘少奇由皖东北返回原驻地半塔集附近大田郢，即致力于皖东根据地的建设，并指导整个华中地区工作。6月20日，黄克诚率领的南下八路军到达皖北与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部会师。8月16日，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过淮河，经盱眙到达大田郢，刘少奇向他交代了向东发展的各项任务。与此同时，陈毅、粟裕率江南新四军主力渡江北上，开辟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到9月25日，按照刘少奇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指示，皖东津浦路东和路西抗日根据地已建立15个县级政权和两个专区级政权机构。

刘少奇在皖东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正确地运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解决了存在的各种疑难问题，犹如适时而来的春风喜雨，迅速打开了皖东敌后的抗战局面。”此时，中原局领导的抗日武装已在皖东、皖东北、豫皖苏、鄂豫皖等地建立了根据地，在苏北也已建立了由北向南和由南向北的前进阵地，一旦南下的八路军和北上的新四军胜利会师，开辟华中敌后地区的任务便可完成。

刘少奇迅速扭转了皖东局面，对整个华中工作具有决定意义。他的突出贡献，主要有如下4点：

第一，坚决贯彻向东发展的战略方针。

如何发展华中？这是刘少奇在延安就曾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他在到达豫皖苏边区前后，听取了各方面意见，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以后，于1939年11月11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抽主力部队“去创造苏北根据地”的建议。11月19日，延安复电“完全同意”，并指示江北新四军应“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12月19日，刘少奇再次致电延安，建议把苏北作为华中的“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调江南新四军主力渡江北上，同时派八路军干部迅速南下，共同完成开辟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任。12月27日，延安复电刘少奇，“同意他关于整个华中的发展意见，于是中原局确定了：华中我军实行向西防御，向东发展，开辟苏北的战略方针。”后来的实践证明，上述建议是正确的。

第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

刘少奇到皖东，首先“是集中火力反对右倾错误，反对在反共顽固派进攻面前畏怯、退却、投降”。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要求我军要做好反摩擦的准备。1939年12月

21日，日伪军2000多人向全椒县周家岗和古河地区发起大规模“扫荡”，驻古河的国民党安徽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第十游击纵队司令李本一率部不战而逃。刘少奇指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第四支队组织反“扫荡”战斗。第四支队在司令员徐海东指挥下，与日伪军激战于周家岗、玉屏山等地，击毙日军官2名，歼日伪军160多人，生俘日军分队长1名。乘胜收复了周家岗、复兴集、大马厂、古河等地，在皖东首次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为团结友军抗战，四支队将收复的古河镇仍交还给李本一。

1940年3月，在蒋介石的策划下，华中国民党军队向新四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桂军李品仙部围攻路西新四军第四支队和驻定远县南部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江苏韩德勤也调兵遣将，向路东第五支队进攻，形成东西夹击的态势，摩擦战斗迫在眉睫。敢不敢反摩擦，成了扭转时局的关键。刘少奇及时地提出“坚决反摩擦”的口号，他强调指出：“我们只有敢于坚决反摩擦，敢于争取反摩擦斗争的胜利，善于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才能求得生存与发展，才能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鉴于当时桂军对新四军威胁严重，刘少奇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和地方游击队坚守路东，钳制韩德勤；集中第四、第五支队于路西，首先将向界牌集、大桥一线进犯的李本一部击溃，一举解放了定远县城。各路部队展开自卫反击作战，击退了桂军的进攻，取得了路西自卫反击战的重大胜利。路西激战正酣时，韩德勤部趁虚进犯路东半塔地区。路东部队奉命固守待援。守卫半塔集的部队奋战了七昼夜，以少胜多，击退韩顽的多次攻击。在路西反击战取得胜利后，第五支队、苏皖支队和第四支队一部回师路东，与

西渡运河驰援之叶飞部队东西进击，韩部不支，全线动摇，仓皇溃退到三河（淮河）以北。取得了新四军江北部队在津浦路西和路东自卫反击战的首次大捷，为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在这次皖东自卫作战胜利后，毛泽东致电认为这次反摩擦“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

第三，理直气壮地抓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根据地建设。

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首要问题。刘少奇到皖东之前，整个华中没有建立一个抗日民主政权。他到皖东后，很快了解到当时的主要情况，明确指出：“皖东地区的根本问题，是建立根据地的观念不明确，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放手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解决这个问题是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心环节。”他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响亮地提出“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建立游击队”的口号。在这个口号的动员下，部队和地方党组织立即拟定了扩军计划。“一批批党员干部下乡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仅仅3个月时间，第四、第五支队就由原来的7000余人发展到1.5万余人。黄山的定远、半塔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为建立皖东皖西民主根据地扫清了障碍。刘少奇立即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及时地提出了“放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口号。他把“根据地和人民政权比作是‘家’”。他说：“打日本军要有枪，有了枪还要有家，这个家就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和人民政权。有了根据地 and 政权，我们就可以招兵、征粮、收税，就有人心、有粮、有钱，开展游击战争就有了可靠的依托。”“有的同志问：我们建立政权，派区长，县长，国民党不批准怎么办？”这样会不会破坏统一战线？刘少奇解释说：我们共产党人平事要国民党批准干什么？有利抗战，人民批准就可以干。”